

王铁军
/ 著

全球生产网络与 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Southeast Asia



王铁军
/ 著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Southeast Asia

全球生产网络与 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生产网络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王铁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428-9

I. ①全… II. ①王… III. ①全球化-生产体系-研究 ②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东南亚 IV. ①F1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4924 号

责任编辑 周 丹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全球生产网络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

王铁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262,000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428-9/D·2276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 1 导 言

- 9 第一章 新葛兰西主义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关联
 - 9 一、区域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
 - 25 二、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一体化:结构与功能
 - 37 三、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一体化:行为者、制度与嵌入
 - 42 四、新葛兰西主义对全球生产网络的解读

- 62 第二章 汽车公司:制度、能力和战略
 - 63 一、全球汽车业的发展
 - 69 二、美国和日本汽车企业的生产组织:福特制与丰田制
 - 78 三、丰田制、公司能力与国际化战略
 - 81 四、旗舰公司和供应商:美、日汽车公司的战略类型与外包模式

- 89 第三章 东南亚的汽车生产网络
 - 89 一、贸易、投资的关联与东南亚的全球生产网络
 - 99 二、跨国汽车巨头在东盟四国的布局及战略动机
 - 104 三、日本在东南亚的汽车生产网络
 - 115 四、美国和欧洲在东南亚的汽车生产网络
 - 122 五、总装厂、零部件供应商与东南亚汽车生产网络
 - 131 六、战略联盟:汽车生产网络“嵌入”东南亚的独特方式

- 142 **第四章 全球生产网络与东道国**
- 144 一、新自由国家、发展型国家与国家的“国际化”
- 156 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东盟四国的汽车产业政策
- 174 三、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东盟五国汽车业的发展及产业政策的调整
- 194 四、全球生产网络向东盟欠发达国家的扩张：以老挝和越南为例
- 202 五、产业聚集：全球生产网络与东道国政府的合作与争夺
- 207 六、东南亚国家的权力形态与国家的国际化
- 220 **第五章 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
- 221 一、东盟区域内的制度安排(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 225 二、东盟区域内的制度安排(二)：东盟工业合作计划
- 242 三、东盟区域外的制度安排
- 247 四、新双边主义
- 254 五、新多边主义：世界贸易组织、跨国公司与印度尼西亚汽车案
- 262 **第六章 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社会行为者和社会关系**
- 263 一、东盟当地商业界和“政一商关系”
- 276 二、东盟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工人和工会
- 298 三、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跨国公民社会
- 318 **结语：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区域发展**

导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生产网络如火如荼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东南亚乃至东亚地区,这两种发展趋势交相呼应,甚至不分彼此。一方面,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极大地推进了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一体化又加速了全球生产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甚至超出了生产过程乃至制度建设的领域,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内涵。

关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生产网络,学术界已经作出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种种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说。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一体化的理论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中,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理论成为理解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源源不断地为人们理解区域一体化提供着充满睿智的思想和见解。此外,在国际商学和管理学界,以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彼得·迪肯(Peter Dicken)等人为代表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也应运而生,成为追随者云集的显学。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现实才是长青的。尽管上述主流理论成绩斐然,但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现实发展却总是提出新的课题,尤其是各个区域间的地方色彩常常使得一般性的理论概括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主流一体化理论关注国家权力和制度建设,但却将现行的权力结构视为给定的,忽略了社会关系的跨国重组以及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作用。在东南亚,金融离岸市场

的兴起、跨国公司数量规模的攀升、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政策影响的扩大,都深深地影响着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重组。传统的主流一体化理论因其决定论的理论底色无法对上述结构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近年来出版的大量文献也大多没有超越其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后实证主义理论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作为批判理论之一的新葛兰西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它通过分析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生产、霸权与世界秩序的关系,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理论流派。该流派的优点是关注生产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革,缺点是其视野过于关注欧洲和美国,较少顾及东方国家的状况。

本书希望从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探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弥补其欧洲中心视野的局限,同时结合近年来兴起的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视角,以充分发挥其分析生产关系的长处。但是,以波特和迪肯等人为代表的全球生产网络理论过于强调结构功能,忽视观念、民族和文化的维度。其对经济活动跨国化的分析虽然解释了一体化的驱动力,但对制度、国家和社会内容的忽略又使其缺少了国际政治经济的维度。这些缺点已经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本书将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全球生产网络进行广义的解释,即将其视为一种跨国政治经济空间,充分挖掘其政治和社会内涵,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种生产和物流的组织方式。本书认为,全球生产网络不仅通过功能的“外溢”推动着各类经济要素在东南亚地区的跨国流动,还通过跨国资本的网络影响着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制度框架和政治空间,并反过来受到当地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影响。从新葛兰西主义的角度看,全球生产网络也是新自由主义“世界霸权”的产物,具有其自身的价值观(如推动全球化和一体化)、组织方式(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和物质能力(全球生产体系),其对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嵌入”体现着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霸权在第三世界建立“共识”的过程。它通过生产方式的重组,产业模块的外包、扩散与聚集,将东南亚各国“编织”到全

球产业价值链的巨大网络之中,从而改变着东南亚各国的生产、社会和政治关系。与全球生产网络在西欧、北美的经历相比,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特征:(1)全球生产网络是外来“嵌入”的政治经济空间,不是东南亚各国自发形成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对这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接纳、适应乃至认同属于一种“被动”的反应,用葛兰西的术语来说就是“被动革命”的产物。(2)“新自由主义”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并不顺利,虽然其物质力量、组织方式和观念能够得到当地的部分认同,但同时也总是遇到各类当地因素乃至东道国政府发展政策的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的顶层议程设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各个层面的危机,使其受到从工业化到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压力。所有这些都使东南亚的全球生产网络乃至区域一体化形式表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如北美和欧洲)的特征,表现出合作与斗争共存的现象。(3)就东南亚各国的发展状况来看,“新自由主义”全球生产网络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虽然对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发挥了重大影响,但却未在各国形成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其中泰国比马来西亚表现出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但东盟作为整体而言,不论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还是“发展型的地区主义”,都表现出了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差异。重要的是,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权形式本身也常常是“非霸权”形态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力量。因此,在这些国家,革命与变革的要求并不限于草根运动,那些希望强化和维护资本主义等级秩序的精英也具有变革的冲动。因此有学者认为,东南亚的这些半边缘国家很难接受全国统一的资本主义共识和霸权。¹这样,全球生产网络及其所推动的一体化过程使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进程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本书将以一种新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即新葛兰西主义为出发点,通过考察全球汽车生产网络在东南亚各国,尤其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活动具体展现全球生产与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关系,认为生产过程与组织方式本身也是构成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新葛兰西主

义关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集体行为者,并将社会力量视为理解结构变迁的主要认知模式。为此,本书将考察在汽车生产的跨国化过程中各类行为主体间的物质、制度和思想关系。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专利的转让、地方代理机构等构成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及复杂的全球垂直一体化分工网络;另一方面,全球企业也比以往更加依赖当地的生产网络,“使自己牢牢地固定在了与无数其他企业,跨国的和国内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国有的和私有的公司所构成的外部关系网络中”²。这样,某一国内的小公司就可以同全球生产网络联系在一起。这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迅速地跨越国界,建立了从本地到全球的地理网络和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组织间的协调关系。东南亚各国在与全球生产网络“接轨”的同时,使得原本分散断裂的各国、各地方的经济被编制在一张一体化之网中。

理论界对东盟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是从“地区化”入手,分析和描述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各类经济和市场要素,如贸易和投资的流动等。沿着这种路径开展研究的学者大多为经济学家。二是从“(新)地区主义”出发,强调东盟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活动。该路径的学者多为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

斯塔布斯(Richard Stubbs)和昂德希尔(G. Underhill)对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概念做了综合分析。他们认为,有着一个边界,在边界内部存在明显的紧密联系,内部的互动超过了与外部的互动,这种互动的强化就是“地区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组织给予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外形并制定游戏规则,形成明确的政策,这就是“地区主义”。³

汉斯·莫尔认为,地区主义是对地区化发展的一种社会、政治和学术的反应。汉斯·莫尔认为,地区化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一种客观变化,而地区主义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区对这种客观变化的一种政治把握。还有学者认为,地区主义是“由上而下”的过程,包括政府行动、正式协议和制度创设等;而地区化则是“由下而上的”过

程,是由社会(公司、私人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等)驱动的。⁴

对于“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区分明确指出了“地区化”代表着市场和经济层面的活动,其主体是公司等私行为体,亦即本书所说的“生产网络”;而“地区主义”则是一种政治和制度安排,其主体是各国政府,实际上对应着本书所说的“一体化”制度。在本书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日本汽车跨国公司在东盟产业合作制度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推动着地区一体化的制度建设。

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地区化”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尤其没有从商品链/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看待“地区化”和“地区主义”的关系,即全球生产网络已经渗透到东道国的政治和社会领域,除了旗舰公司、各类供应商、经销商等经济行为体之外,还包括管理人员、劳工、工会乃至各级政府等行为体。在这些行为体的互动中,既存在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的“结构”和“制度”,也存在着社会行为体(社会力量、工会、非政府组织)和政治行为体(国家)之间的“结构”和“制度”的相互渗透与交叉,所有相关的行为体都在某种“结构”的某个位置上按照一定的制度、规则和指导思想从事或影响着生产、设计、研发、转包、销售和服务活动。换句话说,全球生产网络本身也构成了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的结构、制度与进程的一部分。

图 0.1 提出了一个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相结合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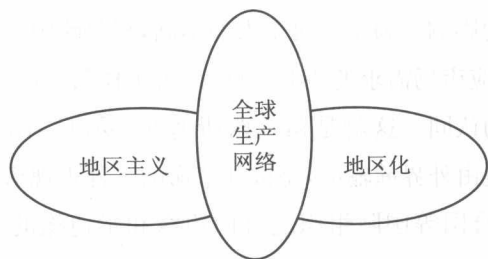


图 0.1 地区主义和地区化相结合的模式

本书考察全球生产网络,但关注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全球生产

网络一部分的地区生产网络,如东盟的跨国汽车生产网络,也就是说,尽管本书关注的公司是全球性的,如丰田和通用等汽车巨头非常明显地制定了全球生产策略并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和销售活动进行布局,但它们在东盟地区的活动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其国际化战略,如开展国际贸易、设立独资子公司、与当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发放经营许可证等方式开展的。本书将通过对汽车跨国网络的考察,说明跨国公司战略与当地政治经济转型的互动,全球生产网络与当地因素共同推进了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东盟“地区化”是通过全球生产网络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嵌入”和当地因素的主动“接轨”这两个过程来实现的。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力量在东盟的制度环境中构建了生产、销售、服务和一体化市场的跨国空间,使东盟的“地区化”成为其所推动的“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全球化”在东南亚“地区”的延伸;另一方面,这种凌驾于本地和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资本力量通过对当地的“嵌入”,在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中培植了与之联系密切的“全球化”的因素,因而导致当地力量出现“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分裂,进而影响了当地的政府政策、社会组织和传统生活。

除了上述物质过程之外,全球生产网络还向东南亚各国及各个阶层灌输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网络(包括政府领导、政府各个部门、国际组织、国内和国外的各级政府、机构)的各种职业教育渠道,利用职业教育和工作场所的培训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施加直接的影响。为了应对工人的不满,相关跨国机构往往充当教育者,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培训,改善工作条件,以期获取工人对新自由霸权的认同。这就是葛兰西所谓的“妥协”(transformismo),但这种妥协是由外界灌输的,是被动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向边缘和半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正确的思想”,引导这些国家的工人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方案。

全球生产网络的“嵌入”还对东盟各国的国家形态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例如,泰国更多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立场,主张采取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的地区主义”,马来西亚则以“发展型国家”的姿态,主张培育本土本民族的实力,实行“发展型的地区主义”。本书认为这两种国家政策形态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实际上代表着两国国内资本谋求“接轨”全球化的两种不同路径,即究竟是通过完全融入更大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谋求核心竞争力,还是通过建立本民族的独立品牌参与国际竞争。鉴于目前的世界经济竞争已经发展为不同的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竞争,民族品牌的发展更加有赖于国家本身的规模、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国家间的竞争关系等超越经济范围的国际政治内容。从本书所关注的跨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来看,目前还很难确定究竟是哪种方式最终更能有利于实现地区发展。但是非常明显的是,企业间的竞争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企业这么简单。正如著名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所指出的那样,企业已经被推到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而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世界体系中中国的“结构竞争力”。⁵

总之,本书从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认为东盟全球生产网络构成了一种跨国政治经济空间,以跨国公司、各类附属公司和供应商为载体的各种技术、组织、生产、销售等要素“嵌入”东盟各国和各地方,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要素的整体系统。市场力量、地方政治和国际政治力量在此相互交织,构成了多种行为主体相互斗争妥协的“跨国空间”。该“跨国空间”一方面为跨国资本和代表跨国资本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主导,具有一定的全球化性质,但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分享全球化红利,谋求地区发展提供了舞台。考察全球生产网络与东盟各类当地要素(如东盟机构、东盟成员国、东南亚的工会、社会团体以及本地技术、组织和领土等资源要素),尤其是与东盟国家权力(如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相互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本内容。本书力图将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商品链理论和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将地理上分

散的经济网络和因此而产生的各类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起来,揭示活跃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各类社会力量在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注释

1. Phoebe Moore, *Globalisation and Labour Struggle in Asia: A Neo-Gramscian Critique of South Korea's Political Economy*,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 2.
2. Peter Dicken, *Global Shift: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third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 223.
3. Morten Boas and Helge Hveem, "Regionalism Compared: the African and Southeast Asia Experiences," in Bjorn Hettne, Andra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Comparing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94.
4. T. J. Pempel, "East Asian Regionalism," <http://www.glocom.org/opinions/essays/20040405-pemmel-east/index.htm>.
5. [英]约翰·斯托普福德、苏珊·斯特兰奇:《竞争的国家、竞争的公司》,张定准、张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第一章 新葛兰西主义与东南亚区域 一体化研究的理论关联

20 世纪后半期世界生产体系的重大变革在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面对超级领土国家的兴起和产业竞争的激化,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已经难以取得战略优势。于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就成为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它们通过内部分工体系将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和合作伙伴的活动进行分工和结合,使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过程之间建立起高度依存的关系,组成一个以价值链为纽带的生产网络。该网络拥有自身的利益和议程,有多个行为者,包括旗舰跨国公司、一级供应商公司乃至零售公司和其他各类附属公司。除了公司行为体之外,其他相关组织,如公司内外的工会、雇主协会、产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乃至国家和国际机构等也纷纷介入,使全球生产网络超出了市场竞争和价值增殖活动的范畴,包含了复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领域的内容,成为各类行为者、各种制度和进程斗争、合作并取得共识的场所。

一、区域一体化理论:新功能主义、 政府间主义与新葛兰西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经济地区的区域一

体化发展日益明显。与此相应,学术界关于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也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对所有时期、所有地区进行有效解释的宏观地区理论,但相比之下,有关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有着较强的理论概括力和解释力。在对北美、亚太地区一体化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往往倾向于借鉴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成果,尤其是从其主流理论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中吸取营养。

(一) 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理论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在早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度被称为欧洲一体化的官方哲学。

与传统功能主义相比,新功能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区分、行为体的多元主义观念和行为体与超国家制度的互动。

1. 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区分

哈斯指出:“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是难以分割的。任何经济福利活动的承诺,都产生于基于权力考虑基础之上的政治决定的范围。特定的功能层次不可能离开普遍的关注。总体的经济决策必然先于功能主义者描述的任何具体的功能部门的演进。政治与技术、政治家与专家之间的截然区分并不存在,因为事务性的决策是建立在先前的政治决策基础上的。”¹在此基础上,新功能主义提出了解释欧洲一体化的动力与机制。哈斯指出,一体化是“几个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政治行为体,被说服把它们的效忠、期望和政治活动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的过程,这个中心拥有或要求拥有高于现存国家的管辖权”。²这一定义说明,新功能主义强调一体化发展的逻辑在于行为体及其互动。哈斯认为,一体化的动力不仅仅是来自米特兰尼的技术官僚政治的“自主性”,而且还包括有目的的行为者追求他们的自我利益实现的进程。“欧洲煤钢共同体实践基础上酿成的一体化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由想要一体化的行为体,即由社会精英力量、由实用主义的行政人员和政治家驱动的。一体化理论的关键特征是功能主义和渐进主义,而

非联邦主义和全面的计划。”³

2. 行为体的多元主义观念

新功能主义考虑的行为体并不是国家,而是集团(包括政治政党、利益集团)和政府,认为这些行为体是在一个多元主义的政治环境中追求各自的利益。这说明新功能主义的出现与政治科学中多元主义的发展一致。⁴根据新功能主义的解释,这些集团有明显的组织和资源优势,使它们在共同的问题面前产生一体化反应,并便于建立有效的跨国网络。另外,共同体的精英在特定的政策计划上的密切合作也有利于认知变化。用迈克尔·奥尼尔(Michael O'Neill)的话说,“政策决策方面的密切合作,产生共同的信任和联动感(engrenage)”。联动便于产生对共同问题的共同反应的感情、共识和信任感。⁵这种联动感很快形成习惯,并导致集团态度和战略的变化,最终导致新行为模式的产生。在一体化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变化模式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这些集团将使它们的忠诚转移到新的超国家层次;另一方面,为了进入或影响新的决策中心,这些集团将改变它们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策略。⁶在利益集团发挥作用的同时,一体化进程中政府的权威日益受到限制,各个政府不得不调整它们的行为以适应新情况。

3. 行为体与超国家制度的互动

区域一体化的制度与传统的国际组织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新的地区层次的超国家制度,要求与社会集团直接接近,从而把一体化的过程与成员国国内政治过程联系起来。一方面,一体化过程中的获益,使地方利益集团游说它们的政府支持一体化,其后果是使国家层次行为者认识到地区层次出现的机制和交往的重要性,最终使国家政治体系层次对一体化的支持增长,导致国家层次行为者愿意谈判一体化协定,并向地区制度让出必要的主权;另一方面,地区层次需要一种新的机制代替传统的国家守门人作用模式,由此产生一体化过程与结果。哈斯指出:“地区层次超国家机制,类似于工业国家政府的性质……这似乎表明,不足以在其狭隘边界内实现福利目标的国家,

在地区层次有适合的对应部门。”⁷ 超国家权威也是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它一方面在更广泛的经济部门提出实现更深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另一方面增加地区层次制度化权威。因此,在地区层次,同时存在功能自主的过程和有意识地寻求一体化的行动。

上述内容只是讨论了一体化的行为者和制度的关系,但是一体化的动力在哪里呢? 也就是说,一体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功能主义学者提出了“外溢”说。

杰普·米克尔森(Jeppe Tranholm-Mikkelsen)指出,有三种不同的“外溢”:一是“功能性”“外溢”;二是政治“外溢”;三是“培植”的“外溢”。⁸

功能或部门领域内的“外溢”是指特定领域内的一体化过程,利用它们的功能产生新的合作。保留这些功能需要更紧密的一体化,由此而孕育新的目标和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哈斯认为,外溢是指“某一经济部门一体化的产生和深化,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产生更大程度一体化的压力,而在欧洲层次则产生更大权威能力”。⁹ 由于产业部门间的相互依存,导致相关产业及部门的加入。这一定义实质上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即一体化在本部门任务的深化、一体化在其他部门范围的扩展和在共同体制度层面权威的增加。利昂·林德伯格(Leon Lindberg)把外溢界定为“与某种特定目标相关的特定行动产生一种新的情形,这种情形导致最初的目标只有在进一步的行动之下才能得以保证实现,由此依次产生进一步的条件和更多行动的需要”。¹⁰ 哈斯和林德伯格的功能扩张逻辑,也导致了对当时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新思考,即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决策,将依次产生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货币联盟的压力与要求,最终所有参与国的整个经济实现完全的一体化。¹¹

政治“外溢”和“培植”的“外溢”指各国之间日益加深的经济交往将产生重要的制度后果。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将要求超国家规制(regulatory)能力。功能的“外溢”过程,产生直接从更高的权威层次